

無政府主義思潮與辛亥革命

朱文原

壹、前言

貳、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由來

參、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展開

肆、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言論分析

伍、無政府主義思潮對辛亥革命的影響

陸、結語

壹、前言

辛亥革命時期，孔孟舊學權威凌替，西學之風日熾。國人急切尋求治國之道，就在此時，無政府主義思潮被引入中國。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就組織派系言，可歸納為三大系統：一為部份旅居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所組成的「社會主義講習會」，一為遠寓法國巴黎的另一群留學生所籌組的「世界社」，一為主要活動在國內的「晦鳴學社」。上述這些團體分別發行「天

義」、「新世紀」及「民聲」等宣傳刊物，極力鼓吹無政府主義，在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史上扮演著啓蒙者的角色。

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激越地以文字鼓吹，狂熱地以行動奔走，審視此時期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理論主張，可歸納出幾點頗具代表性的政見，譬如：反對政府的存在、反對狹隘的種族主義、揚棄國家主義及愛國主張、敵視傳統權威、否定民主議會制度及痛斥現行的經濟體制（註一）。究竟這股無政府主義思潮是如何發生？其立論基礎為何？其理論有何特質？其彼此間是否亦存有某種理論的差異性？其主張對辛亥革命的結局和以後的歷史有若何影響？本文之作，即在針對這些問題，除了從思想淵源追溯，探討古典思想裏所蘊含着烏托邦式大同思想的傳統思想影響力外，尤在詳考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者，其實際行爲的過程，予以相互印證。藉以澄清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萌芽期的真相及階段的特殊性，並透過對外無政府派的釐清，就近代中國引介外來思想文化所衍生的種種併發影響，作一粗淺的詮釋，冀能豐富我國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內容。

貳、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由來

清季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想得以順利進入中國，並普遍地滲入國內思想界，除了緣由革命環境的需要，西方學說的引入，近代中國的留學風潮及世界性社會主義運動等因素外，隱伏人們思想深處烏托邦思想的發展，實爲其主要的內緣因素。審視古今中外的烏托邦思想，無論柏拉圖的「共和國」、中國的老莊、抑或是近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康有爲的大同思想，有一共通特色，即均屬於知識階層們思想層次極高的活動，具有濃郁知識貴族的氣息。因此，烏托邦思想與知識份子之間的關係，極爲密切。清季中國知識份子在時代變局強烈的刺激下，因爲對現實的不滿及在近代西方激越思想的導引下，知識份子乃由抗議而離心，更轉而尋覓積極激進的參與（註二），形成晚清思想瀰漫着破壞主義的激進思想。虛無黨的手段和理念，與西方無政府主義中偏頗的恐怖政策，遂廣泛地被國人引介入中國。

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可依理論內涵及組織方式，而以一九〇七年爲分水嶺，區分爲前後期。前期的特色是西方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及活動情形，多由西方教士或外人，透過其所創辦的刊物（諸如「萬國公報」、「北華捷報」等

涓滴傳入。此時期的西方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及理論，習慣性地被人指責為「亂黨」、「叛逆」，並且與俄國虛無黨的活動混為一談。及至後期，由於東西學術交流日密，中國留學運動的興起，使得國人得以親身體認近代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潮的真貌。一九〇七年六月，於日本及法國兩地的中國留學生，巧合地創辦了兩份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天義」及「新世紀」。隨後又有真正無政府主義的鼓吹者劉師復創辦「民聲」雜誌，從此，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遂進入另一層次的言論及活動階段。關於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由來，茲分為如下四點：

(1) 傳統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從中國固有文化中取得的思想淵源，如孔孟的「大同思想」，老莊的「虛無主義」和許行的「並耕學說」，此外也還兼有若干的佛教思想在內之無政府派宣稱：「老言自然，墨言兼愛，佛言樂極，耶言平等，與夫今之無政府黨、社會黨，皆大同主義也。」（註三）這些人，把儒家的「禮運大同篇」當作無政府主義經典（註四），把老子視為無政府主義的發明家（註五），作為中國的無政府始祖加以崇拜。無政府派對魏晉時期信奉老莊學說的鮑敬言的「無君論」特別注意，說鮑的言論「與無政府之說同至于道德，而捐法制，非軍備，而賤財貨，尤屬清源之論。」（註六）即是無政府主義的源流之作。因此，儒家的「任民自化」，道家的「廢滅一切人治」，老子的「無為而治」，許行的「並耕」設計，都成了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根據。

(2) 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流變 十九世紀中葉，普魯東（Pierre Proudhon 1809 ~ 1865）在其所撰「何謂財？」（What is Property?）一書中，首度視無政府思想為一政治理念，而以「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標明，才正式開啓近代無政府主義運動之幕。普魯東之後，繼續為無政府主義運動奮鬥者，是一位俄人，名叫巴枯寧（Michael Bakunin 1814-1876）。巴枯寧是首位將無政府主義理論體現在政治運動之上者。巴枯寧的無政府理論建立在無政府主義，無神論及自由合作的獨立社團之上。以摧毀國家制度為其主要的奮鬥目標（註七）。

承繼巴枯寧領導無政府主義運動，而被後人視為集其大成者，是一位俄國貴族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克氏思想可視為近世無政府主義的主流。其理論主張以一九〇二年出版的「互助論」（Mutual Aia: A Factor of Evolution）一書最具代表性。是書為一冊古典反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著作。旨意在於闡釋「互助」於人類進化過程裏的重要性。克氏認為「互助」為自然及社會奮鬥生活的主要力量。因此「互助」遂成為克氏無政府主義思想中，最主要的理論根據。

(註八)。

但是同一時期中有一位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馬拉疊斯達 (Errico Malatesta 1850-1932) 却持相反立場。否定互助精神的功能，強調無政府主義的完成，必須依賴「少數覺醒」及「革命行動」的積極參與。馬氏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不僅導引近代西方無政府主義運動走向暴力路線。對於遠在千里外，汲汲渴求西方政治新知的一群中國革命黨人，個人英雄色彩濃厚的「暗殺主義」，產生了無比的誘惑力。因此，早在一九〇三年馬氏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a, 1896)一書，經由張繼根據日譯本翻譯成中文，於上海發售(註九)。成爲第一本有系統地介紹無政府主義的中文書籍。張繼說明翻譯該書的初衷爲：「今中國正值破壞時代之初，而吾編譯是書，想必能受吾同胞之歡迎，藉其手以剷除此野蠻奴隸世界，而幸甚矣！」(註一〇)由此可知早期國人之所以醉心於西方無政府主義，主要是青睞無政府主義中的破壞主張，認爲破壞主義爲國人最需要的理念。希望「藉其手以剷除」清廷。至於西方無政府主義裡的其他理念，早期傳播西方無政府主義的中國人，毫無能及。僅以工具心態強將無政府主義中的暴力路線引入中國。

(3)日本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影響 近代盛行於中國的新學說、新思想，多數是從日本傳來的。居中引介，留學生實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註一一)。留學生傳播社會主義思想，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透過文字，大量地譯介日本社會主義理論的書刊。在蓬勃的譯書運動下，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發展，受到日本社會主義的影響很大。日本社會主義運動萌芽於十九世紀後半期。最初是一些西方傳教士，有鑑於工業化後的西方社會所衍生的弊病，正重演於工業化遂興的日本社會，亟思相以矯正。他們秉持「博愛」的關懷，希望經由社會主義的公平，爲面臨日益動盪的日本社會，找尋出一條解決途徑(註一二)。

一九〇一年在幸德秋水、河上清、安部磯雄等人領導下，成立「社會民主黨」。該黨綱領所秉持的基本精神爲「自由」、「平等」。實踐方式主張採用和平漸進(註一三)。強烈排斥虛無黨式的暴力行爲、社會革命及階級鬥爭等理論(註一四)。及一九〇五年，幸德秋水因文字犯禁，被日本政府判刑入監。於獄中幸德秋水沈潛苦思，對於現行制度產生懷疑。後又潛心苦讀克魯泡特金的著作，思想爲之不變(註一五)。不久至美遊歷，一九〇六年由美歸來，遂提出「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主張，正式展開日本無政府主義運動。

此時，張繼至遼東策反馬賊，未成返回日本，經由北一輝的介紹，張繼得識幸德秋水、大杉榮等「直接行動」派的領袖

。一見如故之下，雙方往來極為密切，張繼因而分外熱衷於無政府主義（註一六）。一九〇七年二月，劉師培夫婦由上海抵日，透過張繼、章太炎等人的居間介紹，得識幸德秋水、北一輝等人。後來劉氏夫婦受到幸德等人的影響，加上中國革命陣營的糾紛，導致劉氏夫婦皈依無政府主義。並與張繼等人通力合作下，成立「社會主義講習會」。於同年六月十日發行中國第一份專門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報刊——「天義」（註一七）。並且於同年八月三十一日召開第一次社會主義講習會。會中延請幸德秋水擔任講師（註一八）。從此，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無政府主義中的一支，遂與日本無政府運動結合在一起。

(4) 國人對無政府主義的初步認識 在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啓蒙期間，一九〇三年實堪稱爲深具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是排滿革命與立憲保皇在國人心理上輕重轉變的重大關鍵時刻（註一九）。同時也因爲一九〇三年所掀起波濤壯闊的「拒俄運動」，使得東京留學界和上海學界聯爲一氣，成爲「革命運動的軸心地區」（註二〇）。國人在革命風潮激烈的刺激下，思想傾向亦隨著亢奮的革命情緒及日益加深的不滿心理，而趨向激進之境。破壞主義及虛無主義等具有激烈變革特色的思想，遂廣泛地流傳於國內，深深地吸引着國人的注意力。

最先把無政府主義引進中國的，要推改良派在日本出版的「新民楚報」，此外，還有「新小說」和在上海出版的「東方雜誌」。他們報導西方無政府主義者的恐怖活動及思想主張，以此威脅清廷政權。以後革命黨的報刊，如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江蘇」、「民報」、「復報」、「洞庭波」、「河南」、「漢幟」，在上海出版的「蘇報」、「俄事警聞」、「中國白話報」、「二十世紀大舞台」、「神州女報」、「民立報」，在香港出版的「廣東日報」等都刊載文字，進行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潮。

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九日「蘇報」上刊出「虛無黨」一文，大肆贊美無政府黨人「直捷痛快，殺君主，殺貴族，殺官吏，擲身家性命以寒在上者之膽。」一九〇五年，「東方雜誌」第二卷第二號上刊登了「論俄國立憲之風潮與無政府黨主義」，「民報」第九期刊出「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民報」第十號刊出「巴枯寧傳」。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宣傳，主要是介紹無政府主義的「無政府」主張，各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家的活動和思想，特別是巴枯寧的「破壞主義」和俄國虛無黨的活動和手段，以及無政府派的暗殺和恐怖活動。

叁、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展開

無政府主義爲近世社會主義運動巨潮中的一支（註二一）。對於近世政治、社會及思想的變動，影響極爲深鉅。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亦於二十世紀初期分別由留學法、日學界，居中介紹移植回中國。至於正式組織社團，起而鼓吹者，有三：一爲旅居日本的革命志士，諸如：劉師培、何震、張繼、章太炎等人，倡設「社會主義講習會」，創刊「天義」爲喉舌；一爲遠寓法國的李石曾、吳稚暉、張人傑、褚民誼等人所籌組的「世界社」，以「新世紀」周刊爲其機關報（註二二）；一爲主要活動在國內的劉師復派，以「民聲」爲其機關報。經由這些團體的鼓吹，遂開啓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序幕。

(1)「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創立及其活動 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劉師培在妻子何震的鼓動下發刊「天義」，成爲近代中國第一份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同月，劉師培與張繼、章太炎、陶成章等，發起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在留日學界中正式揭櫫無政府主義的大纛。這以後，「天義」實際上成爲「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機關報（註二三）。

「社會主義講習會」係一以演講活動爲主的組織，沒有嚴格の入會規定。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召開第一回大會時，首先劉師培以主辦人身份發表演講。劉師培明白宣示「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主義爲止，乃以無政府爲目的」（註二四）。然後延請幸德秋水闡釋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真諦。幸德秋水首先說明無政府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之異同，認爲二派「雖主義大略相同，而行事之手段則相異」（註二五），因爲「無政府主義欲爲勞動者謀幸福，必先盡去資本案，並顛覆一切政府。政府由歷史上證之，有功于人民者甚少，不過以暴力加于人民而已」（註二六）。這篇演講對於「社會主義講習會」同仁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具有很大的澄清作用。

其後由何震演說，何震主張「無政府主義不僅恃空言也，尤重實行」。實行可分爲三階段，一爲言論時代；二爲活動時代；三爲暗殺時代。而「今中國欲行無政府，以上三事均宜同時並行，即使同志無多，亦可依個人意而行，以實行暗殺。」成立之初，計劃每週集會一次，但據紀錄顯示，似乎並未每星期如期集會。及至後期，甚至間隔月餘，才舉辦一回。紀錄中「社會主義講習會」共舉辦十次演講會。

從講題內容分析，擔任演講的國人，其演說內容大多偏重於對中國現存各種弊病的控訴。至於理論層次的闡釋，似乎多得依賴日本無政府派的介紹。「天義」創刊及「社會主義講習會」的發起，何震認為肩負有兩大使命，即：致力男女平等及鼓吹無政府主義（註二七）。一九〇八年三月，「天義」報停刊，「社會主義講習會」終止活動，旅日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似乎轉趨沈寂。四月間，劉師培與章太炎之間，因私事交惡，對於當時無政府主義的推展，尤為一記沈重的打擊。

劉師培旋又於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獨力創辦「衡報」，繼續鼓吹無政府主義思想。「衡報」創刊後，為避免日本警方干涉，乃偽稱於澳門出版。「衡報」所揭示宗旨有四：（一）顛覆人治，實行共產；（二）提倡非軍備主義及總罷工；（三）紀錄民生痛苦；（四）與世界勞工團體及直接行動派的民黨連絡」（註二八）。「衡報」出版至第十一期，橫遭日本政府封禁。劉師培於迭遭挫折後，於同年底返回中國，正式投身端方門下，而與無政府主義運動完全斷絕關係（註二九）。至此，留日學界革命氣氛一時陷於沈寂，昔日聲光交輝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盛況亦不在。

（2）「世界社」的創立及其活動 由李石曾、吳稚暉、張人傑所發起的「世界社」創立於一九〇六年，次年六月該社發刊「新世紀」周刊（註三〇），鼓吹無政府主義，成為清季國人有計劃倡導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另一支。「世界社」所秉持的無政府主義理念，直接來自於近代無政府主義萌發地的啓迪。因此，對於國人思想的影響，頗為深遠。世界社所示的宗旨，為「傳佈正當之人道，介紹真理之科學」（註三一）。其機關報「新世紀」從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共發行一二一號，內中以李石曾、吳稚暉二人的文章為主，二者文章總和超過全數之半（註三二）。

「新世紀」發刊同時，張人傑回上海進行活動。張氏先於上海望平街成立世界社上海分社，並發行「世界大型畫報」，內容刊載「介紹世界名人、近代偉人之學術思想，以及重要科學之發明」，印刷相當講究（註三三）。後來又出刊第二期，並發行「夜未央」、「鳴不平」等，闡揚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書刊（註三四）。「世界大型畫報」在上海銷售，就革命運動史而言，尤具深意。因為自「蘇報案」後，上海地區重要黨人無法立足，宣傳刊物亦被禁示。當「世界畫報」一出，上海住民深感訝異（註三五），革命情緒為之一振。

張人傑於上海除了結交黨人宣揚無政府主義外，並且極立支援革命黨的活動。一九〇七年七月，革命黨人在廣西鎮南關舉事，張人傑即曾滙五千元至香港「中國日報」社，代為轉交（註三六）。另外，張人傑又支持黨人於上海辦報，當于右任

於上海辦「民呼日報」，張人傑即應允以世界社爲後盾，全力支持。不久「民呼日報」停刊，于右任等又另創「民呼日報」，鼓吹革命。後因觸及清廷禁忌，于右任遭捕下獄，張人傑並延請律師營救。出獄之日，張氏驅車迎接照料，並且支助于右任東渡日本（註三七）。于右任日後回憶時，不禁慨然而云：「（張人傑）不僅爲經濟之挹注，而尤多精神之鼓勵」（註三八）。

「新世紀」創刊未久，因爲內容激進，引起清廷的注目。但因囿於法國法律，未能得逞（註三九）。「新世紀」雖然免除清廷禁阻的陰謀，但因世界社不堪長期虧賠，財務狀況陷入困窘之境。一九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張人傑深感負擔之沈重，乃致函吳稚暉欲辭去於「新世紀」中所擔任的職務，並要求吳稚暉料理「新世紀」善後（註四〇）。直至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二一號出刊後，終因賠累太多，而與「世界大型畫報」同時停刊。

至於李石曾則在一九一一年夏返回中國。往來北京、天津、上海間，並且積極連絡黨人，在天津創立「京津同盟會」，推選適被釋放出獄的汪精衛擔任會長，李石曾任副會長，共同主持會務。並於北京創辦「民意報」，積極從事革命活動。武昌起義前後，在中國北方的革命運動中，扮演著一個極爲重要的角色。

(3)「晦鳴學社」的創立及其活動 一九〇四年，劉師復在日本留學，參加了同盟會。在國外時，受到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俄國虛無黨的影響。一九〇六年，進行無政府主義暗殺活動，成立了「支那暗殺團」。一九〇七年春，他策劃炸死廣東提督李準，事敗被捕，坐獄兩年。出獄後到香港，閱讀「新世紀」等無政府主義刊物，並繼續與革命黨人及無政府主義信奉者進行暗殺活動，潛入京師殺攝政王載灃。辛亥革命後，劉師復以克魯泡特金的門徒自居，傾力傳播無政府主義學說。一九一二年五月在廣州成立「晦鳴學社」，主要幹部有彼岸、佩剛、無放等人。劉師復師承李石曾「新世紀」派思想，將之移植國內，「數年前由『新世紀』所下之種子，至其乃由晦鳴學社爲之灌溉而培植之」（註四一）。

「晦鳴學社」大量翻印在巴黎出版的無政府主義者小冊子，輯印了「新世紀叢書」和「無政府主義粹言」，也出刊了「軍人之寶筏」和「晦鳴錄」。一九一二年，劉師復、鄭彼岸等在廣州成立了心社，作爲聯絡無政府主義者的核心團體。心社力圖建立一種苦行僧和清教徒式的生活，對其實行「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僕役」等十二條戒約。

當袁世凱撲滅「二次革命」後，晦鳴學社和心社亦被解散，劉師復遂走澳門，繼續出版「民聲」周刊。民聲的宗旨是：「持無政府共產主義，反軍事，主張職工聯盟，反宗教，反家庭，主張素食主義，萬國新語，和全世界之和諧。支持所有的科學發明，只要是增進人類幸福的。」（註四二）一九一四年七月，劉師復在上海成立「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並復刊了「民聲」日報。在上海的帶動下，劉石心在廣州成立了「無政府主義傳播社」，南寧楊志道等成立了「無政府主義討論會」。除在國內活動外，他們還在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展開無政府主義宣傳。

肆、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言論分析

一九〇七年六月，「天義」報與「新世紀」周刊分別在東京和巴黎創刊，開始了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另外，因受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俄國「虛無黨」（註四三）影響的中國留日學生劉師復，在參加了同盟會後，即迅速返回國內，組織了「支那暗殺團」，開始實行無政府暗殺活動，並創立「民聲」為其言論宣傳刊物。在這些無政府派的言論中均明確宣稱：他們思想和行動，都是從西歐無政府黨人那裏繼承過來的，「拾一、二師友之唾餘，參與己意，以伸論之。」（註四四）「新世紀叢書」第一集就載有「世界七個無政府主義家介紹」，並譯載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全文。「新世紀」從創刊號起，一直到停刊止，共一二一號，幾乎都刊有介紹世界無政府主義者的文章。為加強對西歐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瞭解，吳稚暉還應邀專門到沙利威爾附近的「鷹山共產村」參觀訪問達三個月之久，後在「新世紀」上發表了「游鷹山村殖民地記」一文，對無政府派的活動大加贊揚（註四五）。「天義」報一開始，就大受日本無政府派的支持和稱贊（註四六），從創刊號起，每星期也都載有世界無政府主義者的介紹和著作，如：「普魯東無政府主義大綱」、克魯泡特金的「未來社會之生產方法及手段」及幸德秋水的「平民主義」、「社會主義精髓」的介紹廣告（註四七）。而且劉師培、張繼等在日本學辦的「社會主義講習會」，就直接邀請幸德秋水、堺利彥等發表演說，進行具體指導（註四八）；劉師培、張繼等人也曾參加過幸德舉辦的社會主義星期五講習會（註四九）。劉師復則在日本留學時，還曾親自跟從一位逃亡的俄國無政府黨人學習製造炸彈的技術，後回國在香港「息影」三年，專研究巴黎新世紀報倡導之無政府主義。（註五〇）

在這些無政府派的言論中，曾系統地提出了無政府、無國家、無軍隊、無法律、無金錢、無家庭、無種界的「理論」。他們首先反對政府的存在，說「政府者，萬惡之源也！」（註五一）在他們看來，不論君主專制政府，或民主共和政府，「皆同軌一轍，爲民之蠹、之蟬、之蛇蝎、之虎狼也」，均「不合于今之公道、真理也」（註五二）。因此，無政府派認爲必須反對任何性質的政府，立即來一個「無政府革命」。與此同時，對於作爲組成國家主要成分的軍隊和法律，他們也深惡痛絕，一概加以反對。在無政府派眼中，不管什麼軍隊和法律，都是「保富者之權利而侵貧者之生計，助強者之任肆而奪弱者之自由」的工具，是最不公平、不合人道的「自由之敵」（註五三）。數千年來，政府之所以有立足之地而不動搖者，就在於此。因此，無政府派要求首先廢除軍隊、廢除法律，作爲廢除政府的主要內容。

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都是些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們提倡「絕對自由」、「絕對民主」，反對一切紀律、一切權威，反對集中領導，用以反對一切政府。他們以「平等」爲口號，說無政府主義「當以平等爲歸」，認爲「人類有三大權：一曰平等權，二曰獨立權，三曰自由權」，「均爲天賦」。如何實現這「三權」呢？「蔽以一言，則無中心，無畛域已耳」。「無中心故可無政府，無畛域故可無國家。」（註五四）從這種極端個人主義平等觀出發，他們尚極力主張「人類均力說」，提出「人人爲工，人人爲農，人人爲士，權利相等，義務相均」，認爲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人人獨立，人人不倚他人，人人不受役于人」，才能「適于人性」、「合于人道」（註五五），也才有真正的自由平等。顯然地，這種無政府主義的極端平均主義，在人類社會中除了空想之外，毫無實質意義。

在經濟上，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也提出了一個立即「廢財」、「廢金錢」的計劃。其理由是：金錢也是「萬惡之源」，是產生貧富、妨碍公理的「大敵」（註五六）。據說，「世界社會上凡多之悲慘殘酷，由汝而生」，因爲有了金錢，有了貨幣，就「不知有公道」、「不知有真理」、「不知有科學」、「不知有性命」了，就不論是什麼殺人越貨，攔路搶劫的事都可幹得出，而只要「金錢」一消滅，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社會始真有平等、自由、幸福之日。」（註五七）當然，這只不過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無政府派認爲，要進行「社會革命」，還「必自破家始」（註五八），因而極荒謬地提出了一個「毀家」的方案。據他們說，家庭的存在，不僅是產生私有制的根基，而且是夫權、父權、君權的先決條件，「故家者，實萬惡之源也。」（

註五九）在他們看來，只有消滅家庭，才能消滅私有制，才能達到無政府的理想。如何消滅家庭呢？他們又提出了一個實行「男女革命」的方案，即取消婚姻，取消一夫一妻制，使人類回復到原始群婚狀態。至於毀棄家庭的社會，應該如何維繫男女及親屬倫理，他們似乎未曾賦予太多的關注。只從病態現象探索，却未能經由全面的考量，求一較公允的答案。

從「大同主義」的空想出發，辛亥革命時期無政府主義者還提出「去種界」，即馬上實行民族大融合的幻想。爲此，他們竭力主張統一語言文字，採用「萬國新語」，認爲只要全世界都使用了一種語言，民族之間的隔閡和差異也就消逝了；而各民族有了共同的語言，採取一致行動，全世界也就進入了無政府的「大同世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辛亥革命後劉師復還曾在廣州和上海成立過「世界語事務所」，後由其門徒繼承，一直到三〇年代才結束。

在革命策略上他們提倡個人暗殺，把革命的成功寄托在個人的冒險行動上。在無政府派看來，辛亥革命的時代是一個「暗殺時代」。「新世紀」第三十四號專門列有「世界暗殺表」，起自紀元前四四年，止於一九〇八年，共四十九例，因爲在他們看來，只有暗殺才是「速政府之亡」的唯一手段。他們不斷鼓吹暗殺主義，除了受到歐美無政府主義暗殺思潮的影響外，爲適應中國革命環境之所需，實爲一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由反對大規模的暴力革命出發，無政府派主張用改良手段進行革命，從而又不自覺地走上「改良派」的通路。他們由其「進化、改良即革命」（註六〇）的觀點出發，反對武力革命。他們主張「書報演說，以化吾民之心」，認爲只要普及無政府主義宣傳，使大多數人承認之，贊成之，則強權不待排而掃地矣。（註六一）因此，他們大力宣揚「教育即革命」，說「無政府之革命，無所謂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更無所謂革命之預備，即以教育爲革命而已，其實則日日教育，亦即日日革命。」（註六二）這種以抽象教育代替武力革命的主張，就使他們的無政府主義帶上了改良派的色彩。

伍、無政府主義思潮對辛亥革命的影響

辛亥革命時期無政府主義思潮的闡揚，對於國人的心靈，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對於民初政局的流變亦具正負兩面的

效果。茲歸納七點簡述如後：

(1) 就革命實行策略言，無政府主義對於革命黨人最大的啓示，即是暗殺主義的傳播（註六三）。早期梁啓超對於暗殺手段亦極贊成，其所持理由是「政府有兵，革命黨無以爲抗」、「革命不能得多數人支持」、「暴動不易守密」等（註六四）。及至一九〇三年國人受到「拒俄運動」的刺激，思想分外激進。大量地俄國虛無黨、無政府黨的革命暗殺事蹟，普遍地流傳於國內。時任愛國女學經理的蔡元培，亦覺得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註六五）。蔡氏除了在課堂講授虛無黨事蹟外，自己亦曾親自習製炸彈。吳越更是宣稱「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爲因，革命爲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爲，革命非群力則不效。今日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註六六）。雖然中山先生極力反對暗殺主義，認爲革命之道，「不獨暗殺而已」，並且認爲「以暗殺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結果定不良」（註六七）。但是暗殺主義發展至此，於國人心目中隱然已是認定爲無政府主義思潮中之一支。

(2) 辛亥革命時期無政府主義思想裏所蘊涵痛斥政府體制、抗拒強權、追求公理正義的理念，透過信仰者涓滴細流地引入，已普遍而又深入的影響人心。胡漢民即認爲，當時的無政府黨人「斥強權，尊互助，於各國政府皆無恕詞。對滿州更恣情毒詈，雜以穢語，使中國從來帝王神聖之思想，遇之如服峻削去其積滯」（註六八）。職此之故，伴隨着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日益高漲，相形之下政府的地位也就如同江河日下。當國人秉持此一理念返視現實世界，所見到的僅是一個顛預無能而又專制的異族政權，遂使國人對於清廷存在着不滿與離心。

(3) 辛亥革命初起，無政府主義者也實際參與革命活動，諸如李石曾等人於北方籌組「京津同盟會」，在武昌革命爆發後，爲支援南方而於清廷心臟部份給予最沈重的打擊（註六九）最後迫使宗社黨氣餒，清帝的自動退位。

(4) 武昌起義後，南北對峙之際，由於時勢的轉移，昔日維繫革命陣營爲一體的主導理念頓失。人們面臨最現實的問題是應該如何建立起新秩序？至於昔日無政府派與革命派統御在革命理念下的分歧意見，此時也紛紛顯現，相互爭執不下（註七〇）。又部份無政府派秉持「功成身退，敝徙榮利」的主張，極力促請南方革命政府顧全大局儘速與袁世凱妥協，最後導致中山先生將臨時大總統一職拱手相讓，對於日後政局的深遠影響，不可謂不大。

(5) 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雖是由二十一條要求及山東決議案所燃起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知識份子提倡學習西洋文明

，並希望能依科學及民主來對中國傳統重新估價，以建設一個新中國。」（註七一）五四時知識份子討論的內容，如孔教問題、文學改革問題、國語統一問題及女子解放問題等（註七二），幾乎全是「新世紀」中所曾經討論過的重點，「新世紀」反宗教反傳統的科學態度，竟成爲五四運動時反傳統的先聲。

(6) 由於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傳播，在革命派內部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妨礙了三民主義革命綱領的宣傳，這種現象我們可由章太炎的身上看出。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一方面進行着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的宣傳（註七三），並公開發表「復吳敬恒書」（註七四），對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主要成員吳稚暉進行批駁；但另一方面，却又讓無政府主義的譯文不斷地在「民報」發表，並且大登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廣告。章太炎自己也發表了諸如「五無論」、「國家論」之類半無政府主義的文章，說「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註七五）。正是在章太炎的主持和影響下，一時間，西方無政府主義的人物介紹和著作譯文充塞於「民報」。而「民報」的編輯們却視而不見，任其自由泛濫，可見革命派內部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地步。

(7) 在組織上，由無政府主義的挑撥離間，也對同盟會和革命黨人起了分化作用。一九〇五年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後，劉師培、何震、汪介權等也乘機混入，他們一面鼓吹無政府主義思潮，妄圖從思想上製造混亂；另一方面，則竭力把日本無政府黨人北輝次郎和田三郎等人引入中國同盟會內，並「欲援引二人任同盟會幹事」（註七六），把同盟會部份權力交給外人。當這一行爲遭到劉揆一人反對後，劉師培等人又妄圖改組同盟會，完全篡奪同盟會的領導權，改變同盟會的性質爲無政府黨。在西歐留學生中，情況也大致相同。自中山先生西歐之行以後，革命派力量也可稱「盛極一時」，但「未幾又復衰頹」，其原因就在於李石曾、張人傑等人，轉向無政府主義，「反刺孫文、黃興」（註七七），造成了革命派的嚴重分裂，亦削弱了同盟會「革命排滿」的實力。

陸、結 語

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可以一九〇七年爲斷限，在一九〇七年以前的無政府主義一直以極含混的姿態流傳於

國內，國人常把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及社會主義混爲一談。一九〇七年以後，鼓吹無政府主義者可大略分爲兩個系統，即旅居日本的「社會主義講習會」和流寓法國的「世界社」。由於二者間在思想淵源及環境背景的不同，使得彼此存在着某種層次的理論差異。另外，「新世紀」大量譯介西方書刊，對清季國人思想之啓迪尤鉅，劉師復日後致力於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推展，主要仍受「新世紀」的影響，其「民聲」雜誌堪稱是「新世紀」的續集。

清季的時代主導理念是革命，雖然無政府派與革命派間存有不可規避的理論緊張性，但是二者同時統整在「革命」的大原則下，由於近程目標的一致，得以暫時化解彼此的衝突。尤其是無政府主義者一再鼓吹革命暗殺，對於部份武裝起義迭遭挫敗的革命黨人，更是具有着無比的誘惑力，於是辛亥革命志士前仆後繼地獻身於暗殺壯舉。雖然他們的手段是無政府的，但是他們的目的却是革命的（註七八）。由於一連串的暗殺事件，導致革命情勢的扭轉，而收相輔相成之效，也可說是無政府主義於革命中頗具深遠的影響（註七九）。另外在理論層次上，無政府主義的盛行，對於革命政府的理論層面，也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由於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擴散，導致革命理論呈現多樣性，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之間，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由於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橫溢而淹沒不彰（註八〇）。

辛亥革命時期無政府主義思潮倏起倏滅，審視其興盛主因，除國際因素外，如從中國內部而言，亦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首先是，民國建立，國家政權發生鼎革，清廷對革命黨及改良派的各種禁忌廢除，從而給各種政治勢力的萌發提供了活動場地。其次是，中國社會經濟衰敗，國破民窮。渴望溫飽，嚮往小康，實現「大同」，成爲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適於此時，引入西方無政府主義，並將之說成是與中國傳統大同思想、老莊哲學會通，形成一種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一時間波濤洶湧，不可遏抑。最後是，各地軍閥割據，政局動蕩，共連禍結，民不聊生，社會大眾渴求新出路。因此，有一小部份知識份子，很容易興起對政治、法律、政權的厭惡感，追求超脫現實的不要政府也不要勞資對立，只求滿足個人的「自由王國」。

至於無政府主義思潮消退之主因，不外空有理想，缺乏具體方案；昧於時勢，而又有悖於社會倫常。兼且無政府派在衡事論理之際，總是從病態現象出發，却未能經由通盤地考量，還原事象的全貌。因此，在完成階段性的任務之後，其論點自不易再引起有識之士的共鳴。處身在「強權即公理」的時局中，無政府派却仍堅持著反政府、反強權，甚至於反對國

家的存在，更倡導荒謬絕倫的「毀家」計劃，其速遭時代洪流所淹沒，實乃不足為怪！誠如劉師復在遺書中所預言者，將隨他「葬身黃土」，大約在本世紀二〇年代末期，披靡一時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中國思想政治舞台上不得不悄然落幕了。

註釋

- 註一：J. D. Forman, *Anarchism* (New York, 1975), pp. 29-58。
- 註二：張朋園：「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1898-1921）」，載「思與言」，七卷三期，頁一四四—四五。
- 註三：民：「無政府說」，載「新世紀」第一號。
- 註四：鞠普：「禮運、大同釋義」，載「新世紀」第一號。
- 註五：民：「好古」，載「新世紀」第二十四號；「天義」第六卷插圖。
- 註六：申叔：「鮑生學術發微」，載「天義」第九、十期合刊。
- 註七：Edwin R. A.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67), p. 49。
- 註八：高畠素之編：「社會問題辭典」，頁七四。
- 註九：廣告「無政府主義出版，定價二角」，載「俄事警聞」，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日。
- 註一〇：廣告：「無政府主義」，載「俄事警聞」，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 註一一：馮自由：「社會主義與中國」（香港，民國九年），頁九。
- 註一二：M.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76-77。
- 註一三：町田辰次郎：「日本社會變動史觀」（東京：東京堂書店，大正十三年），頁四六—四七。
- 註一四：「平民社宣言」，轉引自荒畑寒村：「平民社時代」，頁四八。
- 註一五：堺利彥：「社會運動の方針」，載「明治文化集」，第二十一卷，頁五七八。
- 註一六：北一輝：「支那革命史」（東京：內海文宏堂書店，一九三八年），頁四九。

- 註一七：「天義」第一卷已佚失不可見，依推算出刊日應為六月十日。
- 註一八：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頁三七三～七五。
- 註一九：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台北：遠東圖書公司，民國七二年）上冊，頁三四二。
- 註二〇：吉野作造等「支那革命史」（東京，一九二二年），頁四四五。
- 註二一：A. Fried, *Socialist Thought* (New York Anchor Book, 1964), pp. 328-330。
- 註二二：R. A. Scalapino, *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 2。
- 註二三：同註二二，頁六。
- 註二四：「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開會記事」，載「天義」第六卷，頁一五二。
- 註二五：「幸德秋水演說詞」，載「新世紀」第二十五、二十六號。
- 註二六：同註二五。
- 註二七：同註二四。
- 註二八：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二二八。
- 註二九：劉揆一：「黃興傳記」（台北：帕米爾書店，民國四一年），頁一六。
- 註三〇：「李石曾先生文集」（台北：中央黨史會，民國七一年），下冊，頁九三。
- 註三一：同註三〇，上冊，頁二一七～一八。
- 註三二：吳稚暉的文章有一五三篇，佔總數百分之二二·三；李石曾的文章有二一〇篇，佔總數百分之三〇·八。
- 註三三：「張靜江先生百歲誕辰紀念集」（台北：世界社，民國六五年），頁八～一〇。
- 註三四：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頁三一四。
- 註三五：劉延濤：「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〇年），頁一四四。
- 註三六：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三七年），頁四五。
- 註三七：同註三三，頁四四。

註三八：同註三五。

註三九：李書華：「辛亥革命前後的李石曾先生」，載「傳記文學」廿四卷二期，頁四三。

註四〇：「吳稚暉先生全集」第十二卷，頁一一〇一。

註四一：「師復文存」（廣州：革新書局，一九二七年），頁二二。

註四二：同註二二，頁一一二。

註四三：「虛無黨」是當時革命黨人對俄國無政府黨和民粹黨的泛稱。

註四四：民：「無政府說」，載「新世紀」第三號。

註四五：「新世紀」第五七號。

註四六：「天義」第三卷，載幸德來函：「天義報首冊讀畢，拍手呼快」。

註四七：「天義」第三、五、九、十一、十二、十五各卷。

註四八：據日本「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載：講習會由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同盟會中的無政府主義派共同組成。

註四九：「記東京金曜講演會」，載「天義」第八卷。

註五〇：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二二八。

註五一：「天義」第三卷。

註五二：民：「無政府說」，載「新世紀」第三號。

註五三：同註五二。

註五四：申叔：「無政府主義之平等觀」，載「天義」第四、五、七卷。

註五五：申叔：「人類均力說」，載「天義」第三卷。

註五六：申叔：「廢兵廢財論」，載「天義」第二卷。

註五七：民：「金錢」，載「新世紀」第三號、第四號。

註五八：漢一：「毀家論」，載「新世紀」第四一號。

註五九：鞠普：「毀家譚」，載「新世紀」第四九號。

註六〇：眞：「進化與革命」，載「新世紀」第二〇號。

註六一：民：「普及革命」，載「新世紀」，第十五至二十三卷。

註六二：「無政府主義以教育爲革命說」，載「新世紀」一六號。

註六三：「新世紀」第五號載眞：「駁新世紀革命叢書附答」；第一四號載醒來：「五十年中元首喪其元首」等文，均一再鼓吹暗殺。

註六四：張朋園：「梁啓超之迎拒虛無主義」，載「大陸雜誌」三十八卷八期，頁一八～一九。

註六五：「蔡元培自述」（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六五年），頁三九。

註六六：張玉法：「晚清革命文學」（台北：經世書局，民國七〇年），頁一〇。

註六七：申桐：「革命閒話」（手抄本，黨史會藏），頁一九。

註六八：「胡漢民自傳」（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八年），頁七五。

註六九：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三七年），頁一二〇～二五。

註七〇：胡漢民對劉師復所統率的「香軍」，即流露出強烈的不滿，參見「胡漢民自傳」，頁七六。

註七一：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hina Taipei Rainbow-Bridge Co., 1971)* p. 5.

註七二：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載「新青年」七卷一期，頁五～一〇。

註七三：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民報十五期。

註七四：「民報」十七期。

註七五：章太炎：「國家論」，載「民報」十七期。

註七六：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二一〇。

註七七：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六輯，頁一八。

註七八：「辛亥革命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二〇。

註七九：彭英明：「評辛亥革命前的無政府主義思潮」，載「文滙報」，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註八〇：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三六三。